

三味书屋

佳客遍京华

——评《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

傅晓慧

北宋时，东京汴梁在一般士人的心目当中，绝对是个“圣地”，它不仅当时的繁华所在，还是帝都皇城。苏辙从四川眉山第一次远赴东京时，就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表达了自己初来乍到的欣喜与惊讶：“至于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廩、府库、城池、园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文章聚乎此也。”苏辙的这种看法在当时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而《朝堂之



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一书主要就是探讨外地来京的士大夫们于朝堂之外，错综复杂的人际交往活动。

古代读书，无非为了求仕，士人阶层和东京的官僚阶层也就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除了体现在地位、身份所要求的公共活动中，也反映在本书所说的“交游”两字上。外地士人来到东京，人生地不熟，可又想尽快融入这一地域的社会关系中去，于是他们便拼命找在京的亲属、同乡或师长，这背后倚仗的其实是血缘、地缘和学统关系的支撑。莫看佳客遍京华，要想真正在此立足，还得展开拜谒、走访、宴饮、雅集和送别这五种主要的士人交游方式。

“拜谒”这一交游方式明显受到了科举制度的影响。宋初，为了增加进士及第的可能，举子圈里流行向知举官行卷的风俗，也就是年轻学子向一些名宿儒儒投拜谒，希望借此来投师问学，博得赞誉，从而扩大声名。渐渐地，拜谒者和被拜谒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师生”关系。后来朝廷为防士大夫阶层结党营私，颁布了“禁谒”制度，但事实上，人情社会中实质性的座师和门生关系不是凭一项制度的出台就可以彻底切断的。

“走访”活动和东京士人的社会

融入、休闲活动甚至后来的党派纷争都有一定联系。本书列举了梅尧臣七次到汴京，和友人的走访及“嘉祐四友”、苏轼诸友的相互走访，说明了士人在政治文化环境中，即便是私人性的相互往来，也难免会显出艰难和尴尬来。

“宴饮”是北宋的士大夫群体非常热衷的一项活动，但他们在寺院、馆阁、衙署及酒肆茶馆等地和知己好友畅饮言欢，势必会牵涉到花销费用和享乐意识提升的问题。书中提到欧阳修刚到汴京时经常叹穷，说无钱沽酒。后来有了酒钱，又觉得自己“无钱买娇羞”。再后来，真正发达了，一样是养宠物、蓄歌姬。这种物质追求就是北宋社会享乐思想的流行在士人中造成的影响。

至于“雅集”，那对文化和“物质”的要求就更高了。这里所说的“物质”，不是指一般的经济实力，还包括文人收藏中高档次的书画、碑帖、金石器物……此外，这种聚会的召集者也得具有强烈的文化号召力和凝聚力，不是说一个土豪发几张贴，就会有人来参加。当时雅集的召集者多为文采风流的驸马爷、书香门第的大家等。

“送别”作为朝堂之外的一项文人的生活内容，分为私人送别和公共送别两种，其中私人送别占了绝

大多数。比如在京游学、参加科考的举子要返乡了，还有根据当时的改官选调制度，在京城做官要去地方州县任官了，都会引得好友、同僚前来送别。若是罪臣外贬，前来送行的人还担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像仁宗时，范仲淹因触犯了执政吕夷简，被贬饶州。当时“士大夫莫敢往别”，只有王质扶病前去饯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官场之中，最是患难方可见真心！至于群体性的公共送别，往往是因为送别的主导者和参与者有着特定身份，常见的就是朝中的名公巨卿离京，送者云集。

尽管士人的交游本质上属于个人日常生活的范畴，反映的也是个体的情趣追求、理想抱负，但同时它又难以摆脱特定时代的制约，带有鲜明的政治、文化色彩。加之东京是天子脚下，不少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也会折射到士人们的日常交游之中，所以，所谓的“朝堂之外”不过是一种表现，依赖科举生存的士人，身在江湖、心在朝堂才是现实。当然，文人之间那些自由往来、诗歌唱酬以及休闲娱乐也确实能体现他们的生活状态，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就在其间绽放着绚丽璀璨的光华。从这个角度来看，士人们的交游活动又的确具有“朝堂之外”的文化魅力。

生命的承诺

——《我的生命仅此一次》读后

余娟

“比起无尽的时间长河，我们的七八十年的生命不过是眨眼之间。不论我们如何留恋不舍，岁月还是短暂的令人惋惜，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却还要用高超的才华将时间片片分割，分别用来憎恨、仇视甚至向别人施加苦痛。”

《小王子》的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曾经说过，悲伤是活着的证据，为他人而流的眼泪是



隐藏在人心的宝石。有一首歌叫《爱是眼泪的种子》，然而眼泪又何尝不是爱的种子呢。那些真心为别人落泪的人，他们的眼泪滋润了我如石子般的心灵。”

“没关系，泪水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也许这正是幸福的种子呢！”

这些文字均摘录自《我的生命仅此一次》，这是韩国随笔作家、翻译家、西江大学英文系教授张英姬在患病期间所写的专栏随笔合集。她的文字蕴藏着一股强大的生命力量，让心灵获得能量的补充。

张英姬，1952年出生于首尔，一岁时就患小儿麻痹症，凭借着对生活的乐观和激情，克服逆境，实现了英美文学专家之梦。西江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她向韩国Y大学申请读博，被拒，理由是本科不接收残疾人，博士课程就更不可能了。就像她选择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分享的《老人与海》中的句子那样：“人可以被打败，但是不能被打败。”海明威的这句话支撑着她；虽然肉体的有限生命会结束，但是灵魂的力量、意志、克服逆境的斗志将会永远持续，任何情况下都不会

死亡。张英姬抱着“没有希望是愚蠢，放弃希望是罪恶”的坚强信念，争取到全额奖学金留学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获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翻译学习。此后，她一直以英文系教授、中学英语教材编写者、翻译家的身份积极活动。

作者以她亲身经历，告诉读者：“出生便是承诺。如果生而为树，那么承诺就是炎炎盛夏通过尽情吸水的枝条倾洒绿意；如果生而为花，那么承诺就是灿烂盛开，并以自己的灿烂将世界装扮得更美丽……”在她眼中，自然界里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是珍贵的承诺，因为“它们的出生连接起了这个神秘宇宙的生命之环。”当降生为人，“那当然更是最大的承诺和祝福。”

从小双脚残障的作家，在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后，九年间三战癌症，领悟出能够有幸生而为人便是对生命最大的承诺。这一承诺带来的人生价值和希望，远远超越了残疾的双脚带来的诸多不便，也远远超越了癌细胞对生命造成的伤害和痛苦。在誓言生存下去的承诺面

前，或许，身体的痛苦已经算不了什么；或许，再多的苦难和折磨，最终只为成就诺言的庄严和珍贵。

遵守生命的承诺，“灿烂是因为我生而为人，因为我坚持着活到了此时此刻。”当生命的承诺像繁花层层绽放时，凯旋的门，就在眼前打开。

当翻译家父亲意外去世后，张英姬自叹没有父亲的才华，也不如父亲勤奋，感叹继承父亲的事业太难。不过，她依然克服身体的困难和工作上的繁忙，努力追随父亲的步伐。也许得到父爱母爱的总是很勇敢，在父亲离世后，张英姬帮其完成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成为韩国出版社“合格之星”最多的作者，也是小学、初中、高中教科书编写者中，全部审查通过的第一人。她独自勇敢地填补着父亲走后留下的空白，成为父亲永远的合著者和合译者。

她在病床上完成的书稿，同样包含着积极的信息：“艰难活过的今天就是明天活下去的希望。”《我的生命仅此一次》写的是作者的心里话，大多数内容取材于自身。她的语言似温暖的阳光。

旧书新读

欲望的挣扎及其意义

——读《施蛰存小说》有感

孙文辉

近期从孔夫子旧书网购得吉林文史社出版的《施蛰存小说》，连日细读，不禁感慨施蛰存这个中国早期的“新感觉派”代表人物，绝非浪得虚名。在其小说中，主人公常常是不安分的，他们生活在现实世界，却在心理世界挣扎。他们具有与世俗常人同样的欲望，却由于外在规范的束缚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满足。但不能满足的欲望并不因为长期没有实现而减弱或消失，反而因为规范的压迫更具力量，于是形成了小说人物丰富而曲折的心理波澜。

《将军的头》表现的就是一位有着复杂心理动机的“英雄”。花惊定作为名将将是完美的，他外表俊美，仪态威严，善于练兵打仗，无往而不胜。这样的身份和形象既是一种光环，也是一种枷锁，促使花惊定的一言一行必须符合人们对他的某种行为期待。花惊定自己也在不自觉地塑造自己。

但施蛰存总以世俗人的眼光发掘这些“理想的人”身上的“不理想”的元素。当手下的骑兵调戏一个姑娘的时候，作为将军，花惊定毅然按

军法处决了那个骑兵，但作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男人，他不得不承认“这姑娘的声音非常的清脆”，想“也难怪部下的骑兵要干出不正的行动了”。这时的花惊定显然与被杀的骑兵无异了，只不过由于身份的约束，没有将心理动机现实化而已。

当花惊定发现姑娘的哥哥战死后，他“满心得意”地回转头去村中寻找姑娘，姑娘看着这无头的将军，却以极其漠然的态度调侃起来：“喂！打了败仗了吗？头也给人家砍掉了，还要洗什么呢？还不快快地死了，想干什么呢？无头鬼还想做人么？”这不啻一个晴天霹雳，花惊定刚刚萌发的情爱之花刹那间化为乌有。读到这里，人们往往动情于花惊定对姑娘的执着，却忽视了花惊定的眼泪——暗示着欲望在身份的压迫下的顽强与惨烈。

如果说这类“理想的人”出于身份的考虑，要通过主动放弃人的世俗内容而变得残缺，那么另一类“残缺的人”则因不幸失去人的世俗内容而变得残缺。在施蛰存的小说中，“残缺的人”主要是一些生活上不美满的女性，如周夫人、婊阿姨、素贞、卓佩珊夫人等。与“理想的人”相比，施蛰存对她们世俗欲望流露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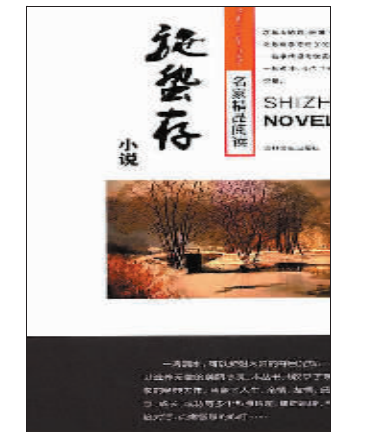
多的同情与理解，他站在她们的立场上，努力用精细的心理分析探寻她们异常行为背后的合理性，肯定被扭曲了的世俗人性的正当性。

《春阳》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典型。十几年前，婊阿姨的未婚夫在吉期前突然去世，为了得到继承权，婊阿姨毅然抱牌位成亲，但用青春换来的大笔财产似乎并没有给她带来预想的幸福。眼看着昔日的老伴一个个体，享受着天伦之乐，婊阿姨日甚一日地怀疑起自己的选择来。当她从乡下来到上海，在都市的繁华和温暖的春阳的刺激下，婊阿姨尘封已久的欲望被悄悄地唤醒了。在银行，婊阿姨发现一个年轻的职员对着她瞧，不禁“心里一动”。出了银行，阳光、男人、女人使她紧闭的欲望热烈地燃烧起来，甚至冒出了“人有的时候得看破些，天气这样好”的大胆念头。

不过，婊阿姨在寻求残缺的世俗内容时，始终受到一股被金钱异化了的力量的制约。她看着南京路上花花绿绿的商品很动心，但结果只买了一条毛巾手帕。她很想舒服服地吃上一顿，而结果只在冠生园里吃了一元钱的东西。她看着夫妇俩带着孩子幸福的样子，有“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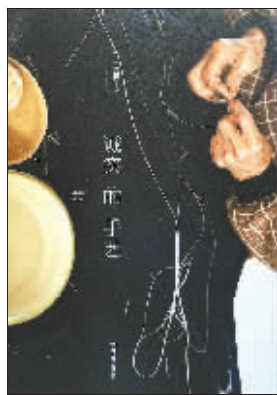
极罕有的勇气奔放起来，她会想，丢掉这些财富去结婚罢”，但一想到旁人和族人的讥讽，她又沉郁下去了。金钱对于婊阿姨来说是个“鸡肋”，扔掉它，从前的牺牲就会付诸东流；保留它，并不会给她带来实质性的幸福。当银行职员叫她“太太”的时候，她内心所有被唤醒的世俗欲望刹那间灰飞烟灭。由此，我们也见识了世俗欲望的微末与深广。

施蛰存通过小说唤醒了人们长期被各种规范所遮蔽的世俗欲望与权利，从而把“人的解放”的命题推广到了每一个人。



荐书

《诚实的手艺》



作者	(日)美帆
译者	武岳
出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日期	2016年4月

《诚实的手艺》一书作者通过对日本各个地区以及日本传统手工艺人的探访，解读他们对手工艺的热忱、执着和传承，展示了数百年间传承下来的工艺品的独特魅力和撼人之美。

书中收录了这样一段话：“工艺品中有自然之美，最能反映民众的生存活力，所以工艺品之美属于亲切温润之美。在充满虚伪、流于病态、缺乏关爱的今天，难道不应该感激这些能够抚慰人类心灵的艺术美吗？谁也不能不承认，美发自自然之时，当美与民众交融之时，并且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时，才最适合这个时代的人类生活。”因此，手工制作的铁瓶、瓷器、木器、漆具、银器、刀具、玻璃杯、织物、型纸等悉数登场，让读者从中感受传统手工艺制作者大巧若拙的匠心。

手工制作的精品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需要足够的时间：雕刻

一张纸纸需要一周以上的时间，一把上乘南部笈帚的原料收集至少需要三年。在《南部铁瓶》一文中，作者指出：“放弃是简单的，坚持下来绝非易事。”要做出一个上等的铁瓶，需要极致的细心和耐心，必须经过10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完成。而这种名为御釜屋的铁瓶，一年的产量仅100多个，正是因为精工细作，才使得这些制品深受大众欢迎。无形之中，时间其实决定了品质。

在介绍藤里木工时，作者特别提到了一块展板，上面写着“匠之生存活力”。问到其中的含义时，工坊主人说：“匠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在田间种稻，在自家院子打制家具，这样的画面是我渴望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虽然现实很难，但自己种出的米还是最好吃，最让人安心的，家具也一样，没有什么比自己创造的更有价值了。”作者美帆在后记中说：“手作之物能让人感到温暖，是因为它饱含着制作者的心意，并拥有机械所无法表现的素朴之美。”而这种温暖，始终蕴藏在该书的各个篇目中，让人品尝，让人回味。

(推荐书友：虞时中)

《食有鱼》



作者	古清生
出版	九州出版社
日期	2016年11月

古清生不愧是美食家、美食写作的高手，单单是鱼就写成了一本书，这当然和他走南闯北、经历丰富有关。他从江西到湖北，又到北京，后到神农架，职业转换很大，从地质队员到文人，又到农民，其实也是老板，但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

他不住在海边，写的淡水鱼居多，但很多是名贵品种。比如洵鱼，长江湖北段的淡水鱼，鱼中上品，需砂锅慢炖，只原味就很鲜美；湘江回渡鱼，长在湘潭的湘江里，是人间美味；合肥的三鱼为：银鱼、面鱼、白鱼，都是

巢湖所产；千岛湖的竹鱼，为当地的特有品种；黑龙江的鲤鱼，也是稀罕鱼类；福建霞浦的香鱼，在淡水交汇的溪流中生存，为鱼中珍品。

作者不仅懂吃，还懂得自己动手。书中提到很多鱼的做法，感兴趣的不妨学习一二。泥鳅的做法，除了干煸、黄焖、油炸外，还有红烧。在做“划水”(鱼尾)时，以青鱼为佳，草鱼次之。红烧划水，为琥珀色，诱人。作者说起家乡赣南的红鲤鱼，在浙江的丽水、永嘉等山区梯田中也有养殖。我在丽水吃过一次，比一般的鲤鱼要好吃，连鱼鳞都可以吃。

古清生的文字很俏皮，写对河豚之味意犹未尽时，欲以舌头舔盘子——“我的河豚鱼悄然尽去，余下空洞的盘子，就用目光将它舔一舔，没有人敢以舌试之，那是太过。”

(推荐书友：仇亦斌)

《触摸生活》



作者	(英) 索尔·弗兰普顿
译者	周五军
出版	商务印书馆
日期	2016年1月

蒙田堪称“近代散文之父”，80年前，蒙田的作品经梁宗岱先生翻译介绍之后，逐渐成为中国读者喜爱的书籍。许多读者在阅读《蒙田随笔》时，不禁发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英国作家索尔·弗兰普顿所著的《触摸生活——蒙田写作随笔的日子》，能为我们解答若干心中的疑问。

蒙田及其作品同英国的渊源极深：蒙田随笔在法国本土畅销半个世纪，却在大陆不列颠广受欢迎，不断出现追随者，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培根创作他的随笔集。而400多年后，索尔·弗兰普顿通过多种渠道，试图为我们揭示蒙田这位思想家兼文学家的心路历程。

米歇尔·德·蒙田，原姓埃康，亲属的高世令他“活着已经

失去了新的乐趣”。蒙田在自己38岁生日那天重返家族庄园，圆形塔楼第三层的书房成了他辞官后的隐居地，悲观的情绪却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着蒙田写作随笔“旨在以亲身经历寄语亲朋好友，作为处世之道而已”。创作之初，蒙田引用了许多前贤语录，犹如读书札记、备忘录一般。而后不断雕琢打磨，汲取名家精华，思考分析，推陈出新。其警句妙语，诙谐幽默，却言近旨远，超越个人视野与常识的局限，置身大环境之下认识世界，并试图内化心灵的体验。历经23年的写作，汇成享誉世界的随笔集，后又多次增删、流传、刊行，最终形成了现今107篇通行本。

索尔·弗兰普顿不落细碎琐屑之窠臼，将异闻与真知灼见交相辉映，续写岁月的传奇。随文附有大量插图，如蒙田故居内外景观、《蒙田随笔》早期刊本书影及与书旨相关的图片，可作为了解蒙田及其作品的钥匙。

(推荐书友：戴骏华)